

汉语詈言与中国文化

张 筱 平

要 旨

詈言（罵語）は人を罵るための言葉だ。中国語の詈言は、相手を責めて罵る言葉と辱めて罵る言葉、また善意の罵る言葉と悪意の罵る言葉に分かれている。中国語の詈言の研究には、言語学、社会学と心理学の意義もあれば、中国語を学び使う外国人にとって実用的な価値もある。中国語の詈言と道徳は緊密な関係があるが、しかし絶対的なものではない。すべての中国語の詈言が、またすべての場面で、すべての時間のもとで詈言を使うこと全てが不道徳ではないはずだ。道徳が中国語の詈言の評価に機能している時、まず道徳の価値について具体的に分析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二つの異なる道徳の価値体系にかかわる時、もし国家のため、民族および社会大衆の利益に対して侵害を受けたならば、詈言を使用することが非道徳的とは言えない。でなければ、評価者は侵害する方の道徳の立場に立っているはずである。そのほか、一般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中で、さらに中国語の詈言の動機、効果、および背景、原因と態度などについて観察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詈言への対処についても道徳にのっとるべきだ。中国語の詈言は言語崇拜と言語迷信から生まれたものであり、深く中国文化が内包するものを持っている。その内容から見ると、中国語の詈言の主な攻撃の目標は、中華民族自身がかもっとも価値のあるだと考えている伝統の美德、宗族血縁観念、性観念などである。そして、形式上から見ると、中国語の詈言の中に性や動植

と物品の貶義語に関するものが多い。中華伝統文化は汚い言葉に対しては一貫して否定的な態度を持っている、しかし、汚い詈言を無くすことは短期間の中で実現することが不可能であり、長期間にわたり継続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論文摘要

詈言就是骂人的言语。汉语詈言有责骂和辱骂之分，也有善意的骂和恶意的骂之分。研究汉语詈言既有语言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意义，对于学习和使用汉语的外国人也有实用价值。汉语詈言与言语道德问题具有紧密的关系，但不是绝对的。不是所有的汉语詈言，也不是所有的场景、所有的时空下使用汉语詈言都是不道德的。道德参与汉语詈言评价，首先应对道德价值做具体分析。在涉及两种不同的道德价值体系时，如果是因为国家、民族以及社会大众的利益受到侵害而使用詈言就不能说是非道德的，除非评价者是站在侵害一方的道德立场上。另外，在一般社会交往中，还应该考察汉语詈言的动机、效果、以及背景、原因、和态度等，对詈言管理也应该采取道德的策略。汉语詈言是语言崇拜和语言迷信的产物，具有深刻的中国文化内涵。从内容上看，汉语詈言主要攻击的目标是中华民族认为最有价值的传统美德和宗族血亲观念、性观念等；从形式上看，汉语詈言中有关性的词语和动植物等含有贬义的物品词语居多。中华传统文化历来对污秽的詈言持否定的态度，但对污秽詈言的消除不是短期内可能实现的，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目录

1. 何为詈言
2. 研究汉语詈言的意义
3. 汉语詈言与言语道德
4. 汉语詈言的文化内涵
5. 结束语

一. 何为詈言

詈 (li) 言就是骂人的言语，语言学界亦称“詈词”、“詈语”。但詈词、詈语的范围，从

字面上看，前者在于词，后者在于语，范围过于狭窄。而詈言这一概念则包括了词和语。汉语里，关于骂，一般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只有一个义项，即“用恶意的话侮辱人”（《新华词典》商务印书馆、1999年7月）；另一种解释有两个义项，一是“用恶意或粗野的话侮辱人”，二是“用善意或严厉的话斥责”（《应用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年1月）。

现实生活中，“骂”的确有两种意义。一种是不带任何“脏字”“粗字”的严厉痛斥，我们可以称之为责骂；另一种是带“脏字”“粗字”的骂，我们可以称之为辱骂。两种骂的区别其实不在于善意还是恶意，因为无论是责骂还是辱骂都可以是善意的，也都可以是恶意的，关键的区别在于是否用了“脏字”和“粗字”，也就是“粗野的话”。

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中有这样一段情节，清圣祖康熙帝要统一台湾，想起用被贬到荒原喂马的桀骜不驯的汉臣姚启圣，他派人抓来了姚启圣之后，亲自来到随军大牢严厉斥责姚：“姚启圣，你心中有太多的恨。你愤世嫉俗，你藐视朝廷官员，讥讽皇亲国戚，你让许多人拿你没有办法。你不是不能做官，你是藐视朝廷官员，所以你宁愿在荒原喂马也不愿入朝做官。”“其实朕早就知道你的内心根源是什么。你是死守你们汉族的王道，始终认为我们满洲族人为蛮夷草寇。哼！就说现在吧，虽说你跪在朕的面前，但是你心里未必瞧得起朕。你认为我们满人配不上你们的孔孟之道，配不上你们的黄河长江。满人嘛。满人的骏马弯刀，只能逞一时之雄，远远比不上你们汉人的五千年的文明！”康熙对姚启圣的这一番痛斥，没有一丝恶意，也没有一个“脏字”“粗字”，可姚启圣却认为这是在骂他，而且还连连对康熙说“皇上骂得好！骂得好！”（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第26集）

斥责性的骂不一定是善意的，恶意的也不少。三国时期，很多反对曹操的人都骂曹操是“挟天子而令天下”，是国家的大患。袁绍兴兵讨伐曹操，有人进言说：“以明公大义伐操，必须数操之恶，驰檄各郡，声罪致讨，然后名正言顺。”于是，袁绍便令手下的书记陈琳起草了著名的讨操檄文。该檄文通篇1404个汉字，历数了曹操的罪状，虽说没有什么“粗野的话”，但对曹操而言却句句都是无情的唾骂，因而看了之后，“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三国演义》第二十二回）。二十世纪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林彪、江青的控制下，全国上上下下的报刊杂志充满了斥骂刘少奇、邓小平等国家元勋的文章，这些文章可以说没有一篇不是无中生有的恶毒攻击。

侮辱性的骂以“脏字”“粗字”为其外表特征，骂人者如果以刺激、羞辱、攻击、伤害对手为目的，自然不会善意。两个人吵架，一个骂对方“不是东西”，另一个骂对方“乌龟王八蛋”。这岂止是恶意，简直是恶毒了。但是关系亲密的人，如亲人恋人之间交往交流，有时也会借用一些“脏字”“粗字”调节一下气氛，表示友好或亲昵，常言所说的“打情骂俏”、“打是疼，骂是爱”形象地反映出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比如父亲以欣赏的口气骂儿子“鬼东西”，未婚妻羞答答地骂不懂得亲热的木讷未婚夫“傻瓜”，这些当然不能说是恶意。

显然，我们给责骂和辱骂这两种骂定性时，以善意或者恶意作为区别的标准是很值得斟酌

酌的，因为实际上善意和恶意在两种骂中都存在。无须说，言语生活中骂人很易于引起交际冲突，但并不是所有的骂都易于引起交际冲突。上述事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易于引起交际冲突的往往不在于是责骂还是辱骂，而在于骂人者的动机是善意还是恶意。因此区别骂的善意和恶意还是很重要的，把骂区分成责骂和辱骂的同时，还很有必要将其分成善意和恶意的两种。恶意的骂，其功能在于攻击、侮辱或贬低对方；而善意的骂则反之，在于示爱亲和。

因此，可以说，詈言作为骂人的言语，不仅包括责骂、辱骂，还应该包括善意的骂和恶意的骂。对于恶意的辱骂也可称之为污言秽语的骂，或者叫污秽的詈言等。

詈言作为客观存的语言现象，具有特殊的社会功能。首先是个人强烈情感（尤其是愤怒、痛恨情感）的宣泄，对个人可以起到心理解压的作用。其次，在双向结构的言语交际中，具有震慑或攻击对手的作用，使用者在选择粗野词语攻击对手时，往往会产生负面效应，造成或激化交际冲突，同时在一般情况下也会伤及使用者的文明形象。另外，借用某些詈言表示友善亲和，可以起到调节交际氛围，拉近双方关系距离，加强亲密程度的作用。

二. 研究汉语詈言的意义

汉语詈言是一种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产生并随着中国社会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语言现象，有中国文化背景的汉语言交际就会有汉语詈言，因此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很值得进行研究的一个领域。但是，社会上也有人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骂人的话就是文化垃圾，对这些文化垃圾应该让它在批评声中自消自灭，不应该在口头和文字上宣扬，特别不应该对外国人宣扬，因为这样会对社会、对下一代、对我们民族在世界上的声誉，有百害而无一利。这种看法从纯洁规范国家语言和加强社会文明建设的角度看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如果把汉语詈言研究也看成是一种宣扬，与纯洁规范国家语言和加强社会文明建设对立起来，就会走向绝对，有失偏颇。

正如上述分析，詈言就是骂人的言语，但骂人的言语不一定是脏话、粗话（污言秽语），亦即文化垃圾。脏话、粗话只是詈言的一部分，研究詈言包括研究脏话、粗话，但不等同于脏话、粗话研究。关键问题是，既然脏话、粗话是詈言的一部分，而且是主要的一部分，那么研究詈言必定要研究脏话、粗话，而脏话、粗话是否具有研究价值呢？我们认为即使是脏话和粗话，也还有一个具体分析的问题，因为社会言语交际中故意使用脏话、粗话攻击伤害对方的情况有之，由于不知情而误用脏话、粗话的也有之，在特定场合借用一些脏话、粗话表示友善爱意或者自我宣泄某种强烈情绪的更不乏其例。当然，无论如何，脏话、粗话都不能说是文明的，但是，如果明确指出什么是应该避免的脏话、粗话，并指出这把双刃剑在什么样的情况、场合，会对双方造成怎样的伤害，面对脏话、粗话如何处之等等，这对于语言文明乃至社会文明建设不仅无害，反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另外，詈言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汉语有之，英语、俄语、法语、德语、日语等其他语种亦有之，并非中华民族文化的特殊产物，汉语中存在着詈言，亦于中华民族声誉没有必然的绝对的联系。正像中国人都知道日语中有“巴嘎丫路（バカヤロウ）”而不会认为日本民族不讲究文明礼节一样，外国人了解了汉语詈言也不会因此而贬低中华民族，因而忧虑把汉语詈言研究扩展到国外会影响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声誉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相反，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看，外国人和中国人交往或者接触中国文学文艺作品，最感头疼的莫过于汉语詈言了，但这绝不是因为懊恼汉语存在着詈言，而是因为依据本民族文化去解读或使用汉语时，常常被汉语詈言所困，在许多情况下分不清何为詈言，何不为詈言，为什么本民族语言的詈言在汉语里不一定是詈言，而汉语的詈言在本民族语言里又会毫无詈言的意味，汉语詈言究竟有怎样的文化意义，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的民族的文化心态等等。因而，对于学习和使用汉语的外国人来说，搞清楚这些汉语詈言问题倒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必须的，否则就会闹笑话甚至造成交际障碍、纠纷或冲突。国内对外汉语界在研究汉语交际文化时，常常举出这样的事例：一个外国人听到中国人骂“真不是个东西”，很是奇怪：“人本来就不是东西，难道你是东西吗？”弄得人哭笑不得；有的外国人面对鲁迅所说的国骂不以为然，认为骂人者骂对方的母亲，这和被骂的人没什么关系；甚至有的外国人觉得把人说成狗应该是一种褒扬，是值得高兴的。在中外文翻译活动中，汉语詈言也会给翻译家造成困惑和麻烦，很多汉语詈言，直译成外语会造成歧义，以外语詈言作为替代会造成原有语义的流失。可见，研究汉语詈言对于中外交际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价值。

其次，研究汉语詈言（包括脏话、粗话），对于汉语语言学、中国社会学、文化学也都具有重要意义。汉语詈言的产生、变化和发展，无论人们承认与否，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有其独特深刻的社会的、时代的文化背景，其语义深层结构中具有复杂的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反映了中国人特有的审美观、价值观和社会文化心态。现今中国社会存在着詈言，决不是汉语詈言研究的结果，今后汉语詈言的发展也绝不会是詈言研究可能产生的效应。汉语詈言研究的目的，在于使人们（包括学习和使用汉语的外国人）清醒地认识它，尤其是脏话、粗话。因为只有认识了，才能分清其正误、真假、善恶、美丑，才能在各种社会交往矛盾中正确面对，从而使我们的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更加和谐美好。

三. 汉语詈言与言语道德

提起詈言，人们往往将其与言语道德问题联系起来。事实上，无论是那种语言的詈言都与言语道德问题具有紧密的关系，汉语詈言也不例外。但是，如果从言语道德的视角看，认为所有的詈言都是不道德的，这就未免过于偏激、绝对了。詈言与言语道德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等式或不等式的关系。汉语詈言尤其如此。不是所有的汉语詈言，也不是所有的场景、

所有的时空下使用汉语詈言都是不道德的。

第一，道德参与汉语詈言评价，首先应对道德价值做具体分析。毛泽东曾经说过“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反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如果说这种观点具有普遍意义，恐怕现在没有人会赞成的。但它却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真理：世界上的价值观不是统一的，而是多元的，不同的阶级、民族、社会、国家，有着不同的价值体系。道德价值亦如此。从共时的视角看，道德价值具有民族性，从历时的视角看，道德价值具有时代性。也就是说，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国家不可能是同一个道德价值体系，而同一个道德价值体系也不可能一成不变，时代的演变和发展对任何道德价值体系都具有制约作用。

詈言的道德评价蕴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把汉语詈言放到道德的天平上进行评价，必须要看这架天平属于怎样的道德价值体系。在汉语詈言面对不同民族、国家的道德价值天平时，如果是因为民族、国家的利益受到侵害而使用汉语詈言，中华民族的道德价值天平肯定会向詈言者倾斜。鸦片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那段令中国人世世代代没齿不忘的历史屈辱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于是饱含了中华民族血泪和对侵略者、殖民者刻骨仇恨的詈言，如“洋鬼子”、“洋毛子”、“洋毛贼”、“日本鬼子”“小日本儿”等，充满了中国大地，对于这些特定社会环境特定时期的詈言，民族的道德价值准绳赋予了它特定的道德色彩，没有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会认为是非道德的，除非评价者良心泯灭，站在侵害一方的道德立场上。相反，如果在正常的跨文化交际中，置民族与国家大义于不顾，仅仅为了维护一己之私利或小集团的利益，而向对手施以詈言，必然违背中华民族言语道德价值要求，受到谴责。这一点后文还将论述。

其次，任何民族、国家的道德价值体系都是把维护民族、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准则的。中国人民历来把民族、国家的独立、强盛、团结、统一作为最重的道德价值砝码，把破坏民族、国家独立、强盛、团结、统一的人物与言行不仅视作道德的背叛，更视为罪恶和耻辱。因此，在广袤的汉语世界，那些最富有敬仰最充满深情的褒扬色彩的言语往往会属于那些为民族、国家的独立、强盛、团结、统一正在做着和已经做出贡献的人物，而对于那些置民族、国家大义于不顾，破坏或阻碍民族、国家独立、强盛、团结、统一的人物则会给予最无情的言语鞭鞑和最切齿的诅咒痛骂。毫无疑问，对于后者，作为中华民族道德价值体系内的社会成员都会毋庸置疑地赋予它道德的属性。有这样一则流传颇广的笑话：一个人路径一个小镇，走进一家饭馆儿吃饭，坐下来喝酒时忽然愤慨起来，长叹一声骂道：“咳，李登辉这头蠢驴！”邻桌一位魁梧的大汉听了，沉着脸横到这个人的面前劝止道：“这个地方不准这么骂！”那个人一看架势不妙，急忙道歉：“对不起，我不知道这里是李登辉的故乡。”哪知大汉听了更加生气了，大声怒喝起来：“你可真越说越不像话了，这里是驴的故乡！”懂这则笑话的中国人人都知道这是在笑骂李登辉不如一头驴，但由于李登辉数典忘祖、出卖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已经丧尽了道德，因而是不会有人冒天下之大不违去追究笑话作者负有任何道德责

任的，相反，人们在笑声过后，都会为作者在其中表现出的机智幽默和艺术的魅力而喝彩。李敖是中国当代以写政论文见长的著名作家，他从不隐讳自己写作爱骂人，称自己骂人的方法是，“骂人是王八蛋”就要“证明你是王八蛋”。比如谈到台湾现状时，他就毫不避讳地骂那些“要脱离我们的祖国”的一批人为“混蛋”（中国新闻网2001年12月22日《李敖与大陆观众首次对话》）。对于李敖的骂人文风，尽管有些国人并不一定喜欢，但对李敖出于维护民族国家团结统一大义的这种骂，中国人非但不会以不道德加以指责，反而赞其为爱憎分明、言辞犀利。

另外，对汉语詈言进行道德评价，道德价值体系的时代性质也是不可忽视的。任何道德价值体系都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世界上永恒的道德价值体系是不存在的，时代在变化，道德价值体系也必然在变化。如上文所述，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从法西斯铁蹄踏上中华大地的那一天开始，直至抗日战争结束日本军国主义投降，中国人民可以说举国共骂日本侵略者“日本鬼子”“小日本儿”，甚至将此骂编入了儿童歌谣：“小日本儿，喝凉水儿，喝饱了凉水儿，挨枪子儿。”这种骂包含了中华民族对侵略者的愤恨，体现了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因而是符合当时的中华民族道德准则的。屈辱的历史在中国人民心中深深地打上了烙印，但星移斗转、事过境迁，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中日永不再战”和“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代友好下去”已成为两国人民的共同心声。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为了中华民族自身的利益，中国人民就要和世界各国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建立和保持良好的关系，互相尊重，友好往来，真诚相待，这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华民族道德价值体系中跨文化交际的最重要的法则。因此，如果在如今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下，遇到日本人，发生了某些交际矛盾或冲突，开口就骂“日本鬼子”“小日本儿”，这就很不道德了，并且有辱于中华民族的声誉和形象。对其他国别的外国人也是如此，如果动辄就以“洋鬼子”“洋毛子”等詈言相向，同样是极端不严肃不负责任的行为，不符合新时期中华民族的道德要求，必须加以反对。当然，跨文化交际是双向互动的，新时期的中华民族道德要求国民对外国人给予尊重，同时也期待得到外国人，特别是历史上曾经给中华民族带来过深重灾难国家人民的尊重。对于过去那段饱受屈辱的历史时期外国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侮辱性质的词语，比如“中国人和狗”、“东亚病夫”、“支那人”等，中国人民是非常反感的，并且视为耻辱，教育后代，铭记在心，刻骨铭心。所以，如果作为外国人，不能认识和理解这一点，对中国人使用这样的词语，必然会伤害中国人的感情，轻者会被认为无知、不道德，重者会激起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愤慨乃至民族仇恨。这也是我们所必须言明的。

第二，衡量一般社会交往中的汉语詈言是否道德，对詈言动机、效果和形式的考察也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如果詈言动机是正义的善良的，效果是积极的融洽的，无论形式上是否带有脏话粗话都不能说是不道德的。比如前文提到的电视剧《康熙王朝》，康熙帝委以姚启圣统一台湾的重任，当得知姚启圣勤政有功但仍然忧虑“圣心难测”，要“称病辞职”时，就

和身边大臣说：“朕不赏他，也不奖他，反而骂他。你们信不信？朕是越骂他，他是越舒服，朕越骂他，他和朕是越贴心。”姚启圣接到康熙帝的骂旨后，果真对康熙帝的骂喜不自禁，称赞康熙帝对他的骂是“千古之骂”，“读之如饮百年佳酿，醍醐灌顶，身心俱醉”。（电视剧《康熙王朝》第29集）。当然，康熙作为一位具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一国君主，为国家之大计而责骂臣子的圣旨中自然不会使用脏话粗话，因而自然不能说不道德。但在现实生活和文学艺术作品中，我们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情景：一个人要自杀或者要铤而走险采取极端行动，危急时刻，另一个人出于无奈突然出其不意怒骂对方，使对方受到震撼，猛然醒悟，从而避免了悲剧的发生。这种情况的詈言者即使使用了最脏最粗的词语，但由于是出于善良动机，是为了维护对方的利益，而且产生了积极作用，人们也不会认为不道德，相反还会赞誉有加。至于生活中人们偶尔借用一下詈言中的脏话粗话来表示爱意，调节一下交际气氛，更不能以道德的尺度衡量了。

其次，如果詈言动机虽然是正义的善良的，可詈言者对詈言效果的预测出现了误差，造成了交际冲突，那么，詈言形式不带脏话粗话的不能说不道德，带脏话粗话的可就不能不被视作不道德了。此种情况属于好心办坏事，生活中的事例比比皆是，值得人们警惕。

再有，如果詈言动机是非正义非善良的，仅仅是为了维护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而恶意侮辱伤害攻击对手，无论形式上是否带有脏话粗话，效果肯定不会是积极融洽的，那么这种詈言肯定是不道德的，也是不文明的。

第三，对汉语詈言的道德评价，詈言产生的背景和原因也是十分重要的考察内容。在阶级压迫、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即使邪恶的压迫阶级一方没有使用詈言，而正义的被压迫的一方使用了詈言，甚至使用了最脏最粗的詈言，中华民族的道德戒尺也肯定会指向邪恶的压迫阶级一方，而对于正义的被压迫阶级一方，则不但网开一面，还会给予同情。小说《宅门逆子》中，恶霸袁贵欺男霸女，受欺压的善良百姓骂其为“王八蛋”、“畜生”，面对这样的詈言，无论作者和读者，都自然会站到骂人者一边。但是在交际双方根本利益一致的背景下，中华民族道德要求双方以仁、义、礼、信为本，自尊更须尊人，律人当先律己，如果因为鸡毛蒜皮的小是小非就使用辱骂性的詈言，无论如何都是于中华民族的道德格格不入的。

第四，对汉语詈言的道德评价还需考察詈言者对使用詈言的态度。生活中，骂人的话谁都懂，也谁都会，可有的人一辈子都没骂过人，有的人却动不动就出言不逊、污言秽语。不同的詈言态度，体现了不同的道德修养。比如有报道称，2000年年底，鞍山市竟然出现了小学生抢购一种脏话连篇贺年卡的现象（中国新闻网，社会新闻，2000年12月11日），小学生受好奇心的驱动，年幼无知，情有可原。但该种贺卡的设计、制作和销售者见利忘义，以不负责任的态度在本是体现关怀、表现友情、亲情的文字中乱用和传播诸如“屁”、“屎”、“粪”、“乌龟”、“王八蛋”、“笨蛋”等侮辱人的污秽字眼，是道德修养十分低下的表现，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犯罪。又如报载，“他妈的”早被鲁迅论为“国骂”，国人本当以用为耻，但

天津市居然有人自作聪明将其谐音“塔玛地”作为店名。无独有偶，近些年北京流行起一种“京骂”——“傻×”，而且大有扩展成第二国骂之势，十分令人担忧。“京骂”中的“×”发音“逼”，义指女性生殖器，十分不雅，稍有文化修养的人也难于启齿，但它竟然在国家的首都流行开来，有人甚至自以为幽默，同天津那位“塔玛地”店主一样，将“傻×”加上一点当成了饭馆的招牌（邵燕祥《“京骂”与“国骂”》《重庆晚报》2001年5月14日）。更有甚者，目前国内电脑网络上出现了不少新创造出的网络脏话，比如“TMD”（他妈的）、“TNND”（他奶奶的）、“我靠”等，而且使用频率高得令人吃惊，有些网民不知道廉耻，连正常的网络专用语也给改成了脏话，如把“版主”改成了“板猪”，把“封你IP”改成了“疯你爱屁”等等。这种以调侃的态度，即不尊人也不自尊地任意使用侮辱性詈言的行为，不仅是一种道德失衡，还可以说是精神变态，必须给予谴责。

还有一种情况，詈言者明明知道侮辱性的詈言会给对方造成心理上的伤害，却毫不在乎，故意为之。比如网上媒体报道，2001年5月温州市公安局一名巡警在与一名被认为违章的驾驶人员发生争执时，连续使用了十几句“国骂”，结果被该驾驶人员以“诽谤他人名誉、侮辱他人人格”的名义告上了法庭（中国新闻网，社会新闻，2001年9月28日）。如果该案中的巡警使用“国骂”情节属实，那么，作为国家公务人员，自然不会不懂“国骂”的危害，不会不知道辱骂公民会引起法律纠纷，因而实属明知故犯。生活中这种对使用侮辱他人的詈言麻木不仁、满不在乎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毫无道德可言。

另外，还有一种“无意触雷”的情况是很值得提出的。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跨文化交际和跨地域性交际中，詈言者态度严肃，只是不小心误用了汉语詈言，特别是误用了詈言中的脏话粗话，这就不适合动用道德的戒尺。

第五，汉语詈言的管理道德策略。面对詈言如何管理，这是任何民族、国家都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一般说来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管理，一类是个人管理，无论哪一类管理都存在着道德不道德的区分。自然，尽管民族、国家之间的道德观可能不同，但都会采用道德管理策略却是相同的。

无须讳言，汉语詈言无论在形式上、内容上还是使用中都存在违背民族道德的因素，对汉语的纯洁规范和中国社会的文明秩序、国家的文明形象起着不可低估的消极破坏作用，必须加以严格而妥善的管理。从社会管理角度看，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中华文化实施大造反，造成中华文明的大倒退，民族道德的大滑坡，给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文明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但国家政府和各界有识之士对社会文明建设一直都很关注，特别是近一个时期，针对社会上存在的不文明不道德的语言现象，一方面加强了语言文明教育和宣传，一方面加强了组织的行政的管理措施，另一方面不断完善法制法规建设，以保障公民维护个人尊严的权利，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比如上文提到的“京骂”问题，一经媒介提出就引起了北京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从组织上、教育上、舆论上采取具体措施，提出从建立文明的北京赛场入

手，杜绝“京骂”，重塑首都文明形象，据说已经取得比较好的成效。

但是对于汉语骂言管理来说，问题和困难最大的恐怕还是个人管理。因为要建立和维护社会文明秩序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在社会交往中，中国人崇尚“文明从自我做起”的道德自律法则，当发生交际矛盾时，比较容易做到控制自己不首先使用污言秽语，但是，当首先受到他人的污言秽语攻击时，往往会产生如何处理的道德迷惑。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是一部灿烂的道德文化建设、发展史，有着丰富的道德文化理论。但同时，五千多年的文明也是一部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的斗争史，产生出了丰富的人类斗争的哲学理论。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念被错误地不断升级，中华文明中的人类斗争哲学理论也被“去粗取精”发展到了“极至”，以至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似乎只剩下“斗”这一门学问了，毛泽东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军事理论被演变为人际交往的最高道德准则，产生了极坏的社会影响，结果导致社会秩序毫无文明可言，几近崩溃。文化大革命以后拨乱反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展开，社会风气有了明显的好转，这是非常值得庆幸的。但是在怎样处理正常的社会交际矛盾问题上，极左的“斗争”理论的影响还很难消除干净。面对侮辱性的骂言攻击，有人主张应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毒攻毒”、“反唇相讥”或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策略，但还应该注意艺术性，这种主张混淆了新时期正常社会交往的矛盾性质，其实还是没有挣脱极左思想方法的桎梏。面对正常社会交往中的侮辱性骂言，处理得是否得当，关键在于获得圆满的积极结果，对此，中国古人早就提出了“以和为贵”的道德尺度，可“以眼还眼”等处理策略无论怎样艺术也都不会产生积极效果的，“还眼”就是反击，只会使冲突激化，绝不会使冲突化解。因此，比较起来，还是把握住礼让的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采用“以忍为上”、“以德报怨”、“以善抑恶”、“以正祛邪”“以柔克刚”等处理策略更具有道德的力量，常常可以避免冲突，化干戈为玉帛，是我们应该提倡并且发扬的。有这样一则笑话很能说明问题：公共汽车上，由于司机紧急刹车，使得乘客中一位小伙子不留神撞到前面一位姑娘身上，姑娘出言不逊，张口就骂：“德性！”小伙子不急不恼，站直身子对姑娘说：“对不起，撞着您了。不过，我记得这好像是惯性。”车上的乘客听了都笑了起来，姑娘也不好意思地笑了。一场可能会发生的不必要的纠纷得以化解。试想，如果小伙子采用“以眼还眼”式的处理策略，也恶言反击，结果会如何呢？显然是纠纷难以避免，双方的自尊心理和文明形象都会受到损害，姑娘固然有错在先，但小伙子的处理也显得没有涵养，毫无道德价值。当然，在面对侮辱性的骂言，礼让的策略也无法化解冲突，最终的处理道德策略选择自然还可以是诉诸法律。如果人们面对侮辱性的骂言都采取道德性的管理策略，相信污言秽语，脏话粗话就会逐渐失去市场，社会交际秩序就会更加和谐文明。

四. 汉语詈言的文化内涵

汉语詈言是语言崇拜和语言迷信的产物，具有深刻的中国独特的文化内涵。我们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加以论述。

(一) 首先，从内容上看。汉语詈言作为受强烈情感的驱动向交际对手发动攻击的语言武器，攻击的目标自然会选择最具有杀伤力的地方，也就是对手意识中认为最有价值或最薄弱最隐秘最避讳的地方。对中国人来讲，意识中最有价值的莫过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宗族血缘等观念，最薄弱最隐秘最避讳的莫过于“性”和能力智力的弱点、生理的缺陷等。而这些正是构成汉语詈言的主要内容。

中华文化传统美德的内容非常丰富，它以儒家道德文化为主体，融合了道家、墨家、法家、佛家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道德学说，为几千年来的历代中国人所传承，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标识。黄钊先生在《中国道德文化》一书中，总结出现代中国人崇尚的传统美德共有二十项。包括：“天下为公”的奉献精神；“见利思义”的重义精神；“威武不屈”的人格精神；“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仁者爱人”的仁爱精神；“居安思危”的民族忧患精神；“勤劳俭朴”的勤俭精神；“尚中贵和”的和谐精神；“执法不阿”的清廉精神；“返朴归真”的尚朴精神；“厚德载物”的包融精神；“戒骄戒躁”的谦虚精神；“尊老爱幼”的公德精神；“乐事劝功”的敬业精神；“诚实守信”的诚信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主张“非攻”的热爱和平精神；“任人唯贤”的尚贤精神；“尊师重教”的传道精神等等。当然，对中华文化传统美德的具体内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可能还会列举一些，比如“知书达礼”、“上孝下慈”、“礼善往来”、“扶危济困”、“乐善好施”、“反省内求”、“修身养性”、“知恩图报”、“知羞知耻”等。这些中国人所崇尚的传统美德，中国人统称为一个字——“德”，“德”是中国人的脸面，无疑也是中国人处世为人的根本准则。汉语詈言“德性”（也称“德行”）和“缺德”是同义词，“不要脸”也如是，从字面上看，这几个詈言都不具备“粗”和“脏”的性质，可为什么会被中国人定义为粗话脏话呢？恐怕就在于这样的词语对人的精神伤害过甚，杀伤力太大的缘故。当然，汉语中，与传统美德相反的带有否定意义和贬义色彩的词语有很多，比如“无法无天”、“大逆不道”、“损公肥私”、“卖国求荣”、“卖祖求荣”、“卖友求荣”、“祸国殃民”、“数典忘祖”、“见利忘义”、“无情无义”、“不仁不义”、“忘恩负义”、“少廉寡耻”、“贪生怕死”、“苟且偷安”、“奢侈浪费”、“荒淫无耻”、“好逸恶劳”、“贪赃枉法”、“巧取豪夺”、“不劳而获”、“华而不实”、“傲慢无礼”、“自高自大”、“不忠不孝”、“任人唯亲”、“言而无信”、“游手好闲”、“嫉贤妒能”、“贪财好色”、“恩将仇报”、“落井下石”、“好事生非”、“不思进取”、“不学无术”、“无才无德”等等。这些词语都可以作为责骂来攻击对手，如果再加上一些附加成分或脏话粗话就很容易转变成辱骂。比如，“无法无天的恶徒”；“数典忘祖的小

人”；“忘恩负义之流”；“少廉寡耻的东西”；“傲慢无礼的坏家伙”；“言而无信的缺德货”；“恩将仇报的王八蛋”等。诸如此类，詈言者以中华美德的标尺衡量对手，抓住弱点给与攻击，很容易使对手陷于尴尬的境地，或被震慑或被震怒。

此外，庞大的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是建筑在血缘观念基础之上的，因此中国人都十分注重血缘观念，宗族血亲的意识非常强。汉语詈言，将这种最具有价值意义也是最为敏感的观念意识锁定为攻击目标，对中国人来说伤害力非常强，甚至可以说是超强的。中国人尊崇祖先，把对不起祖先视为大逆不道，詈言者向对手发动攻击时，把污言秽语直接拨向对手的祖先是最难以令人容忍的。比如“你们家缺了八辈子德”啦，“你们家祖宗八辈子没做过好事”啦，“×（男性性行为动词）你祖宗”啦，“×你奶奶的”“他奶奶的”等等。鲁迅所论的国骂“他妈的”、“你妈的”和前文所述的“京骂”，也都属于此类型。另外，詈言者以对手的亲族长辈自居，也是对对手宗族的侮辱，如“老子我如何如何”啦，“爷爷我如何如何”啦，“老娘我怎样怎样”啦，“姑奶奶我怎样怎样”等等。还有就是直接把对手划归到自己的小辈队伍里，直呼对手“儿子”、“孙子”，以侮辱对手血脉不纯等等。詈言者使用此类詈言，往往会给对手很大刺激，引发出对手的强烈愤慨，而且在一般情况下，詈言者本人的文明道德形象也会同时丧失殆尽。

当然，在目前的现实生活里，在某些范围内，很多情况下，诸如“他妈的”、“他娘的”、“他奶奶的”之类的詈言，已成为一些人的口头语，只是为了发泄不满的情绪，侮辱对手的宗族血亲的含义已经消失。但我们只能认为这是局部社会环境因素造成的，而不能据此断言此类詈言已经不具备詈言的特征，因为使用母亲祖母这类表示宗亲的词语作为一种不满情绪的发泄，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大不敬，有悖于中华文明。

另外，中国人的性观念非常严肃保守，人们把性视为心中最为隐秘最不洁净的事，人际交往中，最忌讳赤裸裸地谈“性”。在中国，性教育一直是令家庭和学校大伤脑筋的问题，性生活科学的普及也有相当的难度，人们有了性的疑问或发现性器官有问题也普遍羞于咨询和就医，这些恐怕都与传统的性文化观念密切相关。中国人骂人采用性的攻击最为普遍，其目的主要在于侮辱对手的宗族，使用性器官词语时（如前文中的“京骂”）往往含有极大的蔑视。

此外，中国传统社会讲究伦理秩序，等级制度森严，因而逐渐形成了民族的趋高趋尊的社会心理。现代生活中，人们没有把姓王的副教授叫“王副教授”的，而都叫“王教授”，没有把一般职称、职务、职业附加在姓氏之后称呼人的，如“李讲师”、“张职员”、“刘农民”等，恐怕都是出于迎合这种民族社会心理的缘故。于是有意识地将对手贬入到社会等下等等外之列，无疑会给对手造成心理的伤害，这也是汉语詈言主要的内容之一。比如“走狗”、“色狼”、“兔崽子”、“土鳖”、“二流子”、“臭老九”、“下三烂”、“黑五类”等。

再有，从能力、智力的弱点、生理的缺陷的角度骂人是世界性的，汉语詈言也不例外。

中国人常说的“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后者主要是指这种性质的骂人方式。中国人对使用这种方式骂人的人非常反感，詈言者不注意很容易触犯众怒，使自己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一个人在能力、智力上存在着弱点（比如儿童、老人和智商不正常的人），生理上存在着缺陷，他们的心理也往往比较敏感脆弱，正常健全的人们和他们交往，理应多一点儿爱心，多一份礼让，主动伸出援助之手，尽量避免和他们发生矛盾。如果和他们发生了矛盾，也应当避免从能力、智力的弱点、生理的缺陷的角度向对手实施詈言攻击，否则是极不人道，极其残忍的。汉语中“残疾”一词是由“残废”、“伤残”、“病残”发展而来，就是由于“残废”具有否定其人生价值的嫌疑，而“伤残”、“病残”又具有否定其健康的意味，不能体现对残疾人的尊重和残疾人的实际情况。这种变化充分体现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因此如果现代人仍然对残疾人使用“残废”，就无异于骂残疾人“不中用”、“废物”，构成对残疾人的心理伤害。对残疾人构成心理伤害的还有“瘸子”、“瞎子”、“拐子”、“聋子”、“瘫子”、“拽子”、“傻子”等词语。为了尊重残疾人，人们在说明他们的残疾特征时，往往会婉转地避开这些具有轻视意义的词语，比如“腿脚不灵便”，“盲人”，“耳朵不好使”等。对能力、智力存在弱点的对手使用的詈言，一般都有“傻”、“笨”这两个字。如“傻家伙”、“傻老头儿”、“小笨蛋”、“笨老婆子”等等。“傻”和“笨”在很多情况下还有故意嘲笑贬低他人能力、智力低下的含义，如前文中提到的“京骂”即是如此。

还有，中国人讲究人生的“福寿康宁”，珍惜生命与健康，于是詈言中也就有了对生命健康的诅咒和攻击。比如“吃错了药”，“有病”，“挨枪子儿的”，“挨千刀的”，“千刀万剐的”，“老不死的”，“死不了的”，“小嘎嘣的”等等。

（二）从形式上看，汉语詈言（主要是脏话粗话）具有以下特点：

1. 有关性的词语使用频率最高，包括男女性器官词语和男性的性行为动词。汉语中没有女性的性行为动词，这可能与几千年来妇女一直处于受男人支配的社会地位有关，因而汉语詈言中只有男性对女性的性攻击，没有女性对男性的性攻击，女性如果向对手使用性攻击的詈言时往往也会使自身陷于极其尴尬的境地。显然，无论男性和女性使用性的攻击詈言时，受伤害的都是女性，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男女有别、男尊女卑观念的必然反映。

2. 使用动物、植物或其他具有贬义的物品词语作为比拟骂人，除了鄙夷对手，将其划出人类之外，还含有其它文化的意义，显示出中国文化特有的审美观和价值观。比如：

“狗”——比喻忠于主人的奴才或帮助作恶的人：走狗、狗腿子、狗杂种、狗东西、狗屎、狗官、狗仗人势……

“龟”——俗称“王八”，比喻妻子有外遇的人：乌龟、王八、乌龟王八蛋、龟儿子、龟孙子、王八羔子、王八蛋……

“狐狸”——比喻奸诈狡猾的人或善于勾引男人的女人：狐朋狗友、狐狸尾巴、狐狸精……

“猪”——比喻好吃懒做或愚笨无能的人：猪猡、蠢猪、笨猪、肥猪、猪脑子……

“狼”——比喻贪婪凶残或不可调教的人：狼心狗肺、狼子野心、狼狈为奸、色狼……

“蛇”——比喻狠毒的人：美女蛇、地头蛇、蛇蝎之心、毒如蛇蝎……

“鸡”——比喻妓女或心胸狭窄：野鸡、鸡头、鸡心小胆……

与此相应的，“坏蛋”比喻坏人，“混蛋”比喻不懂得事理的混人，“滚蛋”是命令人走开或离开。

“熊”——比喻人蠢笨或形容人胆小无能：真熊、熊样儿、笨熊……

“驴”——比喻声高而无能的人或毫无价值的：叫驴、蠢驴、秃驴、好心当成驴肝肺……

“鼠”——比喻胆小而微不足道的或令人厌恶的、背地里干坏事的人：胆小如鼠、无名鼠辈、鼠目寸光、过街老鼠、油耗子……

“兔崽子”——比喻不安分的令人讨厌的年轻人。

“夜猫子”——比喻夜里活动的人。

还有，“屎壳郎”、“土鳖”、“癞蛤蟆”、“臭鱼烂虾”、“杂种”、“烂菜帮子”和“东西”、“玩意儿”、“贱货”等，比喻地位下贱的人。“冬瓜脸”、“土豆脑袋”等，比喻人的相貌丑陋。“棺材瓢子”、“老帮子”等，比喻人将不久于人世。

3. 使用中国人认为非常肮脏的、不吉利的字眼侮辱对手。首先是有关性的词语，也就是男女生殖器和男性的性行为动作词语。除此之外还有：屁～、臭～、糟～、死～、黑～、～鬼（鬼子）、～星、～神、～蛮子、狗屎、大粪等等。这些词语大多是表示蔑视的，从词语的来源看，有的产生于宗教，如“魔鬼”，有的产生于神话传说，如“丧门神”，还有的来源于古代中原人对边区少数民族的蔑称，如“南蛮子”、“回回蛮子”等。

4. 称谓式。以称谓作为骂人的方式是汉语詈言的一大特点，目的是为了抬高自己贬低对手。这些称谓可分为两种：

家族称谓——自称：“老子”、“祖宗”、“爷爷”、“奶奶”、“姑奶奶”、“老爷”、“老娘”等。

他称：“小子”、“儿子”、“孙子”、“丫头（片子）”、“搭拉孙儿”等。

社会称谓——“老头子”、“老婆子”、“流氓”、“痞子”、“地痞”、“二流子”、“叫花子”等。

汉语中还有一种“具体工作+的”的格式作为称呼也具有轻视的含义。比如“教书的”、“卖东西的”、“剃头的”、“做饭的”、“卖票的”、“收破烂儿的”、“开车的”等等。

5. 数字式。此类也是意在贬低他人。如

“二百五”、“十三点”——骂人愚笨，不懂得常理，鲁莽。

“黑五类”——文化大革命时骂身份或出身不是无产阶级或政治上、历史上有问题的

人。

“臭老九”——文化大革命时骂知识分子。

“下九流”——骂人品位低下不入流。

当然，除以上所列举的以外，汉语詈言的表现形式还有许多，这里恕不一一论述。

五. 结束语

“良言苦口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这是中国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俗谚，表现了中国人对于詈言者采用污言秽语攻击他人行为的鄙夷与不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来对粗俗肮脏性质的詈言持否定的态度，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荀子就曾经说过：“与人善言，暖与布帛；伤人以言，深于矛戟。”（《荀子·荣辱》）古代道家和佛家也将“骂詈”、“恶言”列为“十恶”劝戒人们禁口。现代新文化的先驱者鲁迅更把污秽的国骂列为国民的劣根性，在小说和杂文中都给与过无情的鞭鞑。但是，几千年来，汉语的污秽性的詈言并没有因此消失，这就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汉语詈言的存在不是孤立的现象，有它存在的社会基础，人们要交际，要表达不满或者强烈的情绪，詈言就不可能消失。二是我们明确反对污秽詈言，教育国民和后代耻于使用污言秽语，这将不会是短期内就可以实现的理想，必须长期进行下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上汉语污秽詈言现象愈演愈烈，这与中华民族道德文明极不适应。言语道德失衡是社会心理失衡的反映，但同时也是言语道德研究、言语道德教育传播不足的反应。因此我们在注意消除产生社会心理的原因，调整人们的社会心态的同时，也应当加强言语道德的研究和教育。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近一个时期以来，有些文学艺术家的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污秽詈言，此种艺术方法是否得当，很值得探讨。我们认为，文学艺术家们是通过语言影响和改变着社会公众的，对于维护国家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在构建艺术言语时，应该也必须追求健康积极高尚的艺术言语风格，避免不必要的污言秽语，提高语言的道德水平，对社会言语道德风貌起到涤荡、纯化、升华的作用。

言语的纯洁规范健康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现代文明要求人们采用健康的生活方式，其中也包括言语。我们的言语应该体现真善美，体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文明开悟，高尚情操、聪明智慧，唯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的社会人际关系更加融洽和谐，更加美好。

主要参考資料：

1. 陈汝东 《语言伦理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10 月版
2. 沈锡伦 《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7 月版
3. 秦弓 《中国人的德行》 华龄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版
4. 黄钊 《中国道德文化》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4 月版
5. 郭熙 《中国社会语言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3 月版